

# 中國譜牒研究

全國譜牒開發與利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上海圖書館編

王鶴鳴 馬遠良

王世韋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中國譜牒研究

全國譜牒開發與利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上海圖書館編 上海暨馬遠良王世偉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中國譜牒研究

——全國譜牒開發與利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上海圖書館編

王鶴鳴 馬遠良 王世偉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此書在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12.625 插頁5 字數315,000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 7-5325-2631-3

K·292 定價：89.10元

## 論文作者單位、職稱

孫達人	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
王鶴鳴	上海圖書館研究員
朱維錚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楊冬荃	國家檔案局辦公室主任、副研究館員
葛劍雄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林其鉞	上海五緣文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王泉根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謝俊美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王世偉	上海圖書館教授
嚴佐之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
陳建華	上海圖書館譜牒研究中心副研究館員
翟屯建	黃山市地方志辦公室副研究館員
陳寧寧	上海圖書館譜牒研究中心副研究館員
徐建華	南開大學信息資源管理系副教授
劉志偉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王 鐵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副教授
胡 德	上海圖書館譜牒研究中心
劉尚恒	天津圖書館研究館員
顧 燕	上海圖書館譜牒研究中心
周振鶴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 王振忠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黎小龍 重慶西南師範大學教授  
袁義達 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副研究員  
侯揚方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  
潘耀昌 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教授  
趙華富 安徽大學徽州學研究所教授  
張海瀛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唐力行 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李 吉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來新夏 南開大學教授  
來麗英 蕭山市檔案館  
王力平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  
梁洪生 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陳可畏 浙江師範大學  
錢 杭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錢正民 美國猶他家譜學會亞洲地區辦事處  
常建華 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

顧 問：王元化

主 編：王鶴鳴 馬遠良 王世偉

常務編委：陳建華 陳寧寧

編 委(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世偉 王鶴鳴 吳建中

祝均宙 胡 德 馬遠良

陳秉仁 陳建華 陳寧寧

陳燮君 孫繼林 馮金牛

繆其浩 顧 燕

# 目 錄

- 論族譜與傳統史學 ..... 孫達人( 1 )  
淺論方志與家譜 ..... 王鶴鳴( 17 )  
家譜與年譜 ..... 朱維錚( 29 )  
家譜定義新說 ..... 楊冬荃( 33 )
- 在歷史與社會中認識家譜 ..... 葛劍雄( 42 )  
家譜研究與對外開放 ..... 林其錢( 49 )  
論姓氏譜系與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 王泉根( 57 )  
譜學研究及其社會價值之管見  
——以常熟翁氏家乘為例 ..... 謝俊美( 75 )
- 歷代書目中譜牒文獻的記載及其演變 ..... 王世偉( 82 )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家譜修纂例則瑣議 ..... 嚴佐之( 95 )  
宋以來私修家譜的功能與纂修體例 ..... 陳建華( 108 )  
家譜“譜籍”的確定與著錄 ..... 陳寧寧( 121 )  
略論家譜內容與體例的演變 ..... 翟屯建( 131 )  
家譜的收藏、整理與編目 ..... 徐建華( 139 )
- 附會、傳說與歷史真實  
——珠江三角洲族譜中宗族歷史的敘事結構及其意義 ..... 劉志偉( 149 )

譜牒中關於黃峭的傳說.....	王 鐵(163)
略談家法族規.....	胡 德(170)
《虬川黃氏宗譜》與虬村黃姓刻工.....	劉尚恒(177)
家譜堂號探析.....	顧 燕(193)
家譜與文化地理研究.....	周振鶴(208)
<b>徽商展墓日記所見徽州的社會與民俗</b>	
——以《(歙縣)大阜潘氏支譜附編·文詩鈔》為	
中心.....	王振忠(215)
<b>從《爐山顧氏族譜》看明代東南移民對西南少數民族</b>	
地區的開發與融合.....	黎小龍(228)
姓氏在人類遺傳學研究中的應用.....	袁義達(238)
<b>生存壓力下的人口控制行為</b>	
——中國歷史人口學微觀研究的評述與再探討	
.....	侯揚方(256)
譜牒和中國美術史研究.....	潘耀昌(272)
<b>徽州族譜數量大和善本多的原因.....</b>	
趙華富(279)	
太原張氏起源考.....	張海瀛(289)
徽州方氏的遷徙與社會變遷.....	唐力行(297)
海內望族——“隴西李”.....	李 吉(309)
來氏家譜.....	來新夏、來麗英(320)
《唐杜氏家譜》與杜氏家族.....	王力平(326)
<b>新譜與新志的對接</b>	
——方志界對譜牒的認識和一種理想設計的考察	
.....	梁洪生(339)
<b>目前農村續修宗譜問題研究</b>	
——以浙江中部農村為例.....	陳可畏(358)

瀨川昌久博士《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族·風水·移居》

- 一書解說 ..... 錢 杭(363)  
美國猶他家譜學會介紹 ..... 錢正民(370)
- 80年代後期以來的中國族譜研究 ..... 常建華(373)

# 論族譜與傳統史學

孫達人

## 一個建議

中國的傳統文獻大抵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據《四庫全書》，史部文獻囊括了正史、編年、紀事、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等凡十五類，網羅不可謂不廣。所有這些史籍對於我們瞭解歷史過程當然是不可或缺的史料來源之一，但同時必須注意到，在傳統史籍中原先一直具有的一个很重要的門類——譜牒，尤其是其中的族譜卻被排斥在《四庫全書》外。這是清乾隆皇帝“民間無用之族譜”“毋庸采取”<sup>①</sup>修書旨意導致的結果。自那以來，一個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現象出現了：一方面，包括《四庫全書》在內的官書統統奉旨把族譜排斥在外，不屑一顧；另一方面，民間修譜的熱情卻反而日見高漲。乾隆貶抑譜牒的影響深遠，使官方和上層社會對流行在民間、數量龐大的族譜既缺乏有系統的著錄和收藏，更缺乏深入的研究。族譜從此便完全成為民間自生自滅的讀物，以至於迄今我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種，收藏在何處。國外的圖書機構對族譜的收藏比我們要早一些，像美國猶他州家譜學會共收藏 3109 種；據日本學者多賀秋五郎的《中國宗譜研究》說，該國收藏 1491 種。國內像北京

圖書館的收藏始於 1928 年，截止 1989 年，共計收藏 3 006 種，其中主要為漢文，還有滿、蒙、藏、彝文的<sup>②</sup>。據說，上海圖書館的收藏比北京圖書館的數量還要多些。不過，直到現在，還沒有準確的統計。據《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87 年第 172 期提供的資料，匯總了全國大約有 500 個收藏單位的族譜目錄共有 2 萬餘條（尚未刪除重複的）；另外，有人估計全國共有 3.4 萬餘種，有人估計為 1.5 萬種左右<sup>③</sup>。總之，現存中國族譜究竟有多少，目前還是一個不容易弄清楚的問題。因為，除去各個機構的收藏之外，還有數量更大得多的族譜仍然散藏在民間，從未曾有過任何著錄。浙江省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王志邦在從事地方志編纂工作之餘，對該省散藏在民間的族譜進行了初步統計。蒙他相告，浙江一省民間散藏已超過 5 千種。我的研究生周祝偉對其中蘭溪市民間所藏的 346 種族譜與美國猶他州家譜目錄進行了對查，發現重複的僅 3 種，與浙江省圖書館和杭州大學圖書館進行對查，發現重複的僅 2 種。由此可見，正因為國家和學術機構對族譜的長期輕視，看來，我國族譜迄今主要仍保存在民間，而且民間所存的族譜由於歷經風雨，現今大抵已為非孤即稀的善本。國內外現在究竟還存有多少種族譜是一個亟需弄清而又極難弄清的大問題。清查收藏在公共圖書機構中的族譜是十分必要的，希望能夠及早地公布目錄，但必須同時開展對民間收藏的族譜的清查。否則，中國族譜的收藏統計是非常不準確的。在這裏，我想呼籲一下：請全國和各省的有關部門重視一下這件事，除了公家的收藏之外，同時認真查一查民間散藏族譜的收藏情況。我相信，一旦查清了公私收藏，中國現存族譜的數量肯定將大大超過正史和地方志的總和，也許還可以與整個傳統文獻的總量等多比少。

史料可以作多種分類。例如，如果按編纂者的性質區分，正史和地方志基本上是官修的，是專業史學家的作品，其中往往包含非常嚴格的體系架構和正統的思想原則；族譜主要是民間的作品，雖

然也有體例，卻沒有前者那樣強烈的政治色彩，比較接近一般的民間文書（例如，契約文件、民間人士的文集和筆記、宗教書籍等等），從而往往沒有那種經過官方史學家精心過濾或羅織過的局限性。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布洛赫在著名的《歷史學家的技藝》中對形形色色的史料作了這樣的分類：有一種像希羅多德的《歷史》、霞飛元帥的回憶錄等等，被歸屬為史學家有意寫作的史料，另一種如古埃及墓中的銘文、中世紀的檔案和大量的聖徒行傳等等，則被列入前人不經意留下的材料，認為其本意至少不是為了影響後代史學家的史料。布洛赫在比較了這兩種史料的優缺點之後精闢地指出：

這並不是說第二種類型的史料不會出錯或作偽……若不是藉助這類史料，當歷史學家將注意力轉向過去之時，難免會成為當時的偏見、禁忌和短視的犧牲品。中世紀史專家就會認為農村公社無足輕重，因為中世紀作家很少談及農村公社；他們就會忽略強大的宗教勢力，因為在當時的文獻中這類記載的重要性遠不如貴族戰爭。總之，求助於密芝勒所喜愛的形象，史學將不再是舊時代的大膽探索者，而成為舊編年史家亦步亦趨的門生。<sup>④</sup>

我想特別請讀者注意這段分析，尤其是最後一句話，份量很重，十分精彩。史學是嚴格按照前人所遺留給我們的史料進行研究工作的學科。當代的史學家如果仍然僅僅依據第一種史料研究歷史，那麼我們勢必將落入這樣的陷阱：“史學將不再是舊時代的大膽探索者，而成為舊編年史家亦步亦趨的門生。”在我看來，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史學的科學性的提高，傳統史學在中國真正實現向現代化的轉變，除了方法和史觀的轉變之外，又與史學家對待史料的態度，以及對史料如何選擇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本文當然不可能涉及上述有關第二種史料的全部，也不可能

涉及其中的主要部分。因為，這一切皆非自己目前的學力，亦非本文的篇幅所可能勝任。我的意圖僅僅祇限於對族譜和傳統史學的關係提出一些初步的意見。

## 譜牒與司馬遷對史學貢獻

中國是世界上傳統史學發生最早和最充分的地方。這個事實不僅僅為我們自己，也為其他國家越來越多的史學家所認識。本文不大可能詳盡地分析這種史學現象生成的深層原因，卻以為集中地討論一下譜牒與司馬遷史學的關係應是理解這個問題的一個很好的視角。

偉大的司馬遷為我國傳統史學創置了獨特的框架體系，寫出了空前絕後的史學名著——《史記》<sup>⑤</sup>。試問：為什麼司馬遷能够實現這樣的創造？天才嗎？凡讀過《史記》者，誰都不難發現這個因素在成就他的事業中所包含的巨大能量；家學淵源嗎？祇要讀過《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司馬遷傳》，誰也可以很方便地歷數他的家學淵源及其影響。除此之外，我以為至少還值得認真追究二個因素——亦即譜牒和當時社會對譜牒的需求在形成司馬遷史學中的作用。

人人都會說《史記》在時、空兩方面都堪稱通史性的著作，試問，生活在漢武帝時代的司馬遷究竟憑藉什麼材料來突破一個皇朝的框框，上溯自五帝以來、囊括夏商周秦漢大約三千年以上的歷史呢？讓我們先來讀一讀《史記·自序》中所說：“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在《三代世表》中說得更明確：“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於是《五帝系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十分清楚，他主要是根據“譜牒舊聞”才能够把我國的歷史追溯到當時所可能追述到的大約三千年前的。司馬遷非常尊重孔子，但孔子祇是“因史文，次《春

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在這裏司馬遷說得很客觀也很客氣。過去，孔子是嚴格按照時間順序編纂《春秋》的，而《尚書》無非是一部不著年月的文件匯編。至於他的《史記》則不同，在中國是他首先利用了孔子所存而不論的譜牒。問題的關鍵在於，司馬遷以孔子所存疑不論的譜牒為根據，去追蹤夫子也未敢涉及的古史，這是否可以稱為科學的態度呢？況且司馬遷自己也承認“（這些譜牒）黃帝以來皆有年紀數，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因此，當時和此前時代的學者正是因為譜牒中包含着的不同和乖異，大抵都是持這種懷疑觀點的。唯司馬遷採取了一種全新的態度。轉述難確，還是讓我們再讀一讀《五帝本紀》，看看他究竟為什麼並且以什麼態度和方法來處理這類譜牒的：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司馬遷在這裏又一次告訴我們，他主要是根據譜牒來寫《五帝本紀》的。請讀者注意，司馬遷何以一則特別慎重其事地聲明說，他利用牒譜學編寫的這篇本紀的做法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根本難以理解？再則又用毫不客氣的語氣聲明說，他的這種做法“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五帝本紀》不過三千言，內容多述世系，究竟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使他這樣重視看似很平常的《五帝本紀》呢？

細繹原文可知，第一，當時，正統的儒家、“薦紳先生”都以“其文不雅馴”為由而不屑於傳述流傳於下層社會的譜牒，而司馬遷則不同，他首先在我國把像《五帝德》、《帝系姓》、《世本》等等一大批譜牒利用起來，使史學大大地擴充了史料的來源；第二，他首先親自到“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的全國各地進行調查，從所至各地的“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的調查事實中，找到了像《五帝德》、《帝系姓》這類古文譜牒接近古史實際的確鑿證據；第三，他又首先用《春秋》、《國語》來與譜牒進行比對，從中也找出了《五帝德》、《帝系姓》等古文譜牒具有可靠性的許多無可爭議的證據。這樣，司馬遷就得以在《史記》的有關本紀、表、書中，第一次按世代敘述了我國的上古史。把話說得更明白些，司馬遷是把譜牒與民間長老的傳說即“口頭史學”相印證，把譜牒與已有的史學成果即《春秋》相參證，從而在中國的傳統史學中首先使用了一種新的史料——譜牒，同時也就造成了一種在時空兩方面均前無古人的新史學——紀傳體的通史《史記》。順便說一說，其實，不僅僅是《五帝本紀》，此後的夏、商、周，乃至秦的本紀，以及吳太伯、齊太公、魯周公、燕召公、管蔡、陳杞、衛康叔、越王勾踐、鄭、趙、魏、田敬仲完、孔子等十七個世家也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使用了譜牒。長期以來，歷代的學者受其賜而並不知其然。直到王國維作著名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取甲骨文證明《史記·殷本紀》所載先王世系確為“實錄”之後，史學家中仍未見有多少人進而理解司馬遷所據的譜牒究竟具有什麼價值<sup>⑥</sup>。現在學者大體都認同陳寅恪先生之所謂“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和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是此時代學術新潮流也。治學之士，得預此流者，謂之預流”<sup>⑦</sup>者云云的觀點。不過，以我所見，陳先生的上述見解祇能够說庶幾與司馬遷的觀點近之。因為，以上這些對治史雖然都很重要，卻僅僅祇是觸及到了學術的形式方面，尚未揭

示出史學的本質。

司馬遷給史學的定位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sup>⑧</sup>。假如我們能够從這個事關史學正確定位的角度再來看看他在處理譜牒方面前所未有的態度和方法，就立即可以發現：陳寅恪之所謂“預流”顯然遠遠不足以盡其意。因為司馬遷所倡導的是在開中國史學（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世界史學）的新潮流之先河，而陳先生不過強調要適應世界學術新潮流而已。舉其大者而言之，正如司馬遷本人所說：《史記》中的本紀是要“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sup>⑨</sup>。“王跡所興”是《史記》中經常使用的一個重要概念，其宗旨主要在於“原始察終”。司馬遷的偉大之處不僅僅止於利用當時其他學者不屑於顧及的譜牒去追蹤黃帝以來三千年中歷朝的演變軌跡，更重要的是，他由此進而發現自秦皇朝之後，專制主義皇朝的出現使我國的政治史周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呈現出新的規律。關於這個問題，《秦楚之際月表》是這樣說的：

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鋤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起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

關於“王跡所興”，在這裏叫“王跡之興”。在《史記》的這一篇中，司

馬遷對這個中國政治史的根本問題作了迄今為止最全面、最深刻的概括。幾乎用不着說明，如果沒有譜牒為根據，司馬遷決不可能比較符合事實地回顧虞夏以來長達三千年左右“王跡之興”的歷史；而當他追蹤了自古至今的長時段歷史之後，結果就分明發現：虞夏以來長達三千年左右“王跡之興”的現象在秦楚之際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前此是“無土不王”，無論是虞、夏、商、周、秦，都是有土地的世襲之君，經過幾十乃至幾百年的努力（包括德行的積累或武力的征服）才能實現一個王朝的更迭；而在秦統一之後，情況發生了巨變，恰恰是那些社會下層中的人們，即“無尺土之封”者，奮起壘畝，如陳勝、項羽、劉邦等等，在不過五年的時間裏使中國的政權發生了三次更替。這確實是“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的歷史現象。簡而言之，過去王朝更替中“無土不王”的老例現在已被“王跡之興，起於閭巷”的皇朝周期循環所取代。在當今之中國史學界，對司馬遷在《史記》中破天荒地為大澤鄉的農民領袖陳勝寫世家，為農民戰爭中失敗了的項羽作本紀，並且排列在五帝以來夏商周秦之後、劉邦之前的位置上，對所有這些和其他許多顯然難以在這裏逐個列舉的大膽創新，人人皆知而樂道之；但是，對司馬遷為什麼能够做到這一切，而在當時和此後二千年間我國衆多的史學家卻做不到的問題，至今還很少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假如讓我們認真地看一看他對當時學者所輕視的譜牒是那樣的重視，再深思一下他使用譜牒的方法，深思一下為此而語重心長地說出“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這樣的話，就一定會心悅誠服地徹悟：司馬遷的話決不是高談虛論，他的史學確實與譜牒的利用之間有着深刻的內在聯繫。正因為對譜牒的利用，《史記》才有可能創造出完全不同於《尚書》和《春秋》的那種貫古今、究天人式的通史。

司馬遷對中國史學的文獻根據當然遠遠不止於譜牒；即以譜牒而論也決不止於前文所述。不過，為了節省篇幅，下面準備轉換